



【摘要】 朱熹是南宋“主战派”中坚定的成员，并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钻研兵法，以期扭转国家政治和军事积弱的局面。在熟悉兵法的基础上，朱熹结合他自己的理学思想，对兵家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一方面他肯定兵家攻守相互为用的辩证法思想，对兵家强调胜负取决于能否得天下之心的思想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他又站在儒家的立场，对兵家有所批评和贬低，认为其学说不能与儒学相提并论，且易引起“穷兵黩武”的消极影响。他还对兵家以诈取胜、玩弄机心的思想提出批评，以维护儒学所倡导的诚信道德观。

【关键词】 朱熹；兵家；《孙子兵法》；理学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0)04-067-3

朱熹所生活的南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积弱之朝，时刻面临着异族的威胁和入侵。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南宋对金人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求和称臣，以维持眼下的安定和荣华富贵；还是宁死不屈，索性和金人抗战到底？“主和派”与“主战派”在朝野内外各有大批支持者，而朱熹就是“主战派”之中坚定的一员。朱熹曾屡次向朝廷进谏和上疏，一再阐明他反对同金议和、坚决抗金的主张，“恭惟国家之与北虏，乃陵庙之深仇，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闻者，其不可与共戴天明矣……今释怨而讲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祸，将使三纲沦、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违而天地闭塞，夷狄愈盛而禽兽愈繁。”^{〔1〕}要求以天理为指导，贯彻君臣父子仁义之三纲五常，抗战复仇，尊王攘夷。既然要作战，就必须要有合适的兵法作指导，故兵家之学一时大盛。兵家是先秦、西汉初期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和战争实践总结的学派，

其重要代表人物有孙武、孙臆等人，其中孙武所撰的《孙子兵法》代表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最高成就。与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朱熹熟读《孙子兵法》，对兵家的学说有着相当的了解。作为一位理学大师，朱熹并未像其他人一样，对兵家学说只是一味的赞同和跟从，而是与他自己的理学思想相结合，从他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兵家学说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一、朱熹对兵家的肯定

朱熹对兵家学说的评价，总体上来说，肯定与贬斥兼而有之。

首先，朱熹对于兵家攻守相互为用的辩证法思想予以肯定。在《晦庵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中，朱熹在论分与不分的关系问题时指出：“此说分得好，然又须见不可分处，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一事，而实相为用也”，肯定兵家攻守兼顾，相互为用，分与不分的辩证关系。朱熹赞同兵家“欲伍以

〔作者简介〕 解茗，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生，四川 成都 610066。

参”的思想,作为窥敌制变,战胜敌人的方法。他说:“兵家谓窥敌制变,欲伍以参。今欲窥敌人事,教一人探来,恁地说,又差一个探来,若说得不同,便将这两说相参,看如何,以求其实。所以谓之欲伍以参。”^[2]对于《武经总要》所记载的窥敌观变和欲伍以参的思想,朱熹表示认同,主张客观全面地了解敌情,派出至少两人侦查敌情,两相比较,以求其实,克服一人探报有误的偏差。这是对兵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充分掌握敌情,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来正确用兵思想的吸取。

除了对兵家兵法上的肯定,朱熹最为欣赏的,是兵家对人心的重视。兵家虽不像儒家一样,将仁义道德作为其学说的核心,但对于战争的正义性和人心的向背,兵家一直都非常重视,强调利民而不害民。《孙子兵法·计篇》中将战争获胜的条件归结为“五事”,即:“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其中“道”是居于首位的。何谓“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3]孙子将正义的战争称为有“道”之战,认为只有正义的战争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人民的利益,人民才会去英勇作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畏危”,这是战争胜利的首要因素。如果离开人民的拥护,仅靠统治者的支持发动的战争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注定要走向失败。所以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4]。

兵家这种重视战争的正义性、重视人心向背的思想与儒家十分切合,因此深获朱熹赞赏,他在阐述其学说理论时,亦常常援引,对兵家有所肯定:

“盖兵家之事,不在交锋授战,然后胜负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则士气百倍,寇叛归服”^[5],肯定兵家得天下之心是取得胜利的根本的观点。

不过,与兵家不同的是,朱熹所谓的“天下之心”,不仅包括要“得民心”,还包括要“正君心”。朱熹认为,“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6]因为君主之心与常人之心一样,都有天理人欲之别,因此都要存天理、去人欲。而由于君主的特殊地位,君之心能否做到存天理、去人欲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

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7]可见在朱熹看来,君心的好坏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安危,是解决政治、经济、军事诸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本”,所以要想真正赢得军事上的胜利,首先君主要做到“正心诚意”,只要去掉心中的私欲、体认到了天理,那么现实中的一切问题、困扰、阻遏也就都随之迎刃而解了。这是朱熹将他的天理学说与兵家学说相结合所形成的特殊之处。

二、朱熹对兵家的批评

朱熹对兵家虽有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是作为一位理学大师、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者,朱熹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对于兵家还是有所排斥和批评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以仁政治天下,以德礼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面对暴力与丑恶,儒家崇尚的是道德教化,这与奉行以暴制暴,凭武力得天下的兵家可谓截然相反。另外,两家在价值观上也有着极大的差异。在义与利之间,儒家历来看重的是义,对于做事情看重其出发点是否“合于义”也远远超过其结果是否能够得到“利”。而在兵家文化中,功利性一直是其十分突出的一面。对于战争,兵家的态度是“非利不动”^[8]、“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9],军事智谋上首先关注的也是利害得失,“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10],充分反映出兵家的功利性。虽然兵家也重视战争的正义性,强调战争要有“道”,但这份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只有正义的战争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他们重视的不是正义性本身,而是其所能够带来的结果,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核心思想和价值观的对立,使得儒家对兵家始终表露出一一种否定甚至鄙视的态度,朱熹亦不例外。他虽对兵家的某些说法予以肯定,但在《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的《孟子序说》当中,朱熹以“齐用孙子”等专事攻伐的做法,与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加以比较,肯定孟子的功绩,从侧面反映出朱熹依然是站在儒家的立场,对兵家的评价倾向于以贬为主。

两宋时期,由于民族危机深重,战乱不断,兵家学说极受学者们的重视,南宋学者郑厚对《孙子兵法》有非常高的评价。郑氏认为《孙子兵法》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应比《论语》、《荀子》、《孟子》以

及《易大传》还要高,是先秦时期的第一流著作。朱熹对于郑氏这一看法并不认同,并在在《晦庵集》卷七十三《郑公艺圃折衷》中加以驳斥:“乃谓‘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当尽心,其词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杨著书皆不及。’是启人君穷兵黷武之心,庸非过欤!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审也!以予观之,此段本不必辨,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尧、舜似矣,乃取孙武之书厕之《易》、《论语》之列,何其驳之甚欤!”由此也可见朱熹对兵家学说的贬低之意,认为其根本不配与儒家学说相提并论,并认为兵家学说容易引起“人君穷兵黷武之心”的消极影响。对于这一点,朱熹还曾说过:“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则腹心肝胆皆在人矣。故好征战则孙武、吴起之徒出,而民残于干戈矣。”^[11]表示君主如果好征战,就会使孙武之徒频出,而使百姓遭受战火的摧残,故应该警惕。

朱熹对兵家的批判还有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针对兵家在兵法运用中所强调的“兵不厌诈”的原则。兵家在战争中强调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只要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是否光明磊落并不重要。早在春秋时期,兵家就已开始将诡诈之道运用在战争之中,在《孙子兵法》中,孙武更多次强调“诈”在用兵之道上的重要性。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12]“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

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13],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孙武甚至主张用间,以掌握“为敌之司命”^[14]的战争主动权。孙武这种以诈取胜的战略思想得到了历代军事家的认可,却严重违背了儒家一直以来所提倡的“诚”与“信”的道德观,故一直饱受儒家学者的批判,朱熹就曾对此有过激烈的言论:“若谓姑为纯正之论而其实必用机心,扶阴谋然后可,则是心迹乖离,内外判析,孔子读而仪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吴起、申不害非无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于圣人之门者,正在于此”^[15],认为吴起等人虽有一定的事功,但他们在取得事功的过程中不断玩弄“机心”、策划阴谋,与圣贤的主张在本质上是势不两立的。另外,在《朱子语类》卷五十二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集注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于义,便可以掩袭于外而得之。’曰:‘集义是集众义,故与只行一事相对说。袭,犹兵家掩袭之袭,出其不意,如劫寨相似,非顺理而行有积集工夫者也。’”在这里,朱熹主张集义,认为集义是集众义,不同意只行一事,认为只行一事就像兵家所提倡的出其不意一样,与劫寨无异,明显是对兵家的诡诈之道的嘲讽和贬低。在南宋内忧外患的时刻,当其他的儒家学者对兵家诡诈论的反对立场都开始有些动摇,认为即使诡诈、阴谋之事非君子所为,但只要能取得胜利,在非常时期,也只能作适当的变通时,朱熹则始终站在儒家的立场,坚决予以反对。

【参考文献】

- [1] 朱熹.癸未垂拱奏札二.晦庵集卷十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 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4] [13] 孙武.孙子兵法·计篇[M].马一夫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1,1,1.
- [5] 朱熹.晦庵集卷九十五上·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上[M].
- [6]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八十[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 朱熹.晦庵集卷十一·戊申封事[M].
- [8] [9] 孙武.孙子兵法·火攻篇[M].马一夫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115,115.
- [10] 孙武.孙子兵法·九变篇[M].马一夫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71.
- [11] 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十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2] 孙武.孙子兵法·军争篇[M].马一夫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63.
- [14] 孙武.孙子兵法·虚实篇[M].马一夫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51.
- [15] 朱熹.晦庵集卷三十七·与刘共父[M].

(责任编辑 李远国)